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（十四）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（十一）《朱岱林墓志》。镌于北齐武平二年（公元571年）二月六日。明朝末年出土于山东寿光，久无人问，清雍正己巳（公元1725年），县人王化洽访得于田刘村神祠中。但此石已被充作香案。文正书，四十行，行三十四字。志石长79、宽108厘米。

王化洽访得此志后，即拓得数纸并题跋于后。此即为该志之初拓本。乾隆戊午（公元1738年）王复广又拓之，此时，虽上角前五行之前八字略显细瘦，但仍字字可辨，不失为全本。嘉庆、道光后，则日益漫漶。咸丰、同治年间拓本，则首行“扶封”二字已全泐，“於邾”二字损右半。其时有以腊涂于“扶封”“於邾”四字处再行模刻，拓之以欺人者，宜详辨。

此志书法在北书中别具一格。翁方纲评曰：“是碑隶楷虽非极工，然其发波已开欧褚之先。”梁启超跋云：“北碑易伤纯滞，此独雄秀，飞动如饥鹰将击侧翅作势。”此言是也。

馆藏最早裱本，系乾嘉拓“扶封”二字未损本。惜中缺失一页，甚憾！此本曾为王懿荣、王孝禹、梁启超递藏。尾有铜梁王孝禹（光绪三十一年中秋月、光绪三十四年正月）及梁启超（民国乙丑，公元1925年）题跋。钤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饮冰室藏”“任公”“燕庭刘氏珍藏”“孝禹心赏”“王瓘之印”“帖祖廛”“梁启超”“历劫不磷”“王小雨”“臣瓘”“启超私印”“新会梁氏”“乐此轩”“孝禹”“丁未生”等印。

馆藏最旧整幅拓本，为顾千里旧藏之咸丰同治年间拓本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(十二)《张景略墓志》。镌于隋开皇十一年(公元591年)正月。清乾嘉年间出土于河南安阳。后藏安阳金石保存所。隶书，十七行，行十七字。志石长43、宽42厘米。

出土初拓本，四行“骑”字右下角未损，“大”字下无石花；六行“奉”字右上角未损；八行“披锦文彩”之“披”字左上角与右下角未损，“锦”字左上角与右半中间未损，“文”字完好，“彩”字右首撇未损；九行“龄”字与下“表”字未损连；十一行“去来”之“去”字完好。道光以后拓，则以上诸字均损。

此志书势不脱北齐习气，但隋志分书极少，此独具一格，亦可宝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出土初拓。此本曾为铜梁王孝禹、新会梁启超等旧藏。有王孝禹题签和梁启超题跋(民国乙丑，公元1925年)。钤“王氏金石”“孝禹”“小与所藏”“铜梁王孝玉家藏古刻”“燕庭考藏金石文字”“小宇审定金石”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饮冰室藏”“梁启超”“启超无极”“千石公庆寿之贝”等印。

馆藏另一初拓本，曾为古皖张德森(木三)、蓬莱丛澍(丛兰西)等旧藏。尾有丛澍题跋(民国甲申，公元1944年)。钤“耐园姚诗志珍秘印”“叔言”“张德森考藏金石之章”“古皖张氏木三珍藏”“张木三考藏金石印”“曾在张木三处”“蓬莱丛氏藏金石刻辞”等印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亦系出土初拓本。此本系陈粟园(峻)及长州章钰旧藏。有章钰题签。钤“茗理金石文”“古欢楼”“章钰印”“陈粟园”等印。

(十三)《巩宾墓志》。镌于隋开皇十五年(公元595年)十月二十四日。清嘉庆二十四年(公元1819年)四月偃师段嘉谟访得于陕西武功县之南乡，并移至武功县署。南海吴荣光刻跋于后。

光绪年间曾归赵乾生及端方。后佚，故诸家著录多失载。文正书，三十一行，行三十二字。盖篆书。志石长52、宽51厘米。

该志出土初拓本，第一行“骑”字下半未损，“将军”二字完好，“右”字下半未损。道光以后，上述诸字均已损泐，即“骑”字存上半，“将军”二字泐，“右”字存下半。

此志书法属北派，颇有隶意。岳小琴题跋赞之曰：此志体兼篆隶，古藻缤纷，而笔下葱茜端凝，一片神行跃跃纸上，洵楷书之化境也。毛凤枝云：“此志书法迥美，格局方正，隋刻之佳者，可宝也。”段嘉谟称此志“其文沿齐梁之习，而字体高古，有钟羊法。篆盖亦得汉魏遗意，后人不能及也。”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出土时之初拓本，此本为岳小琴旧藏。尾有其题跋及“岳氏家藏”“小琴所得金石”“小琴平生最赏识者”等印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亦系出土时之初拓本。此本曾为王孝禹、梁启超递藏。有王孝禹题签以及王孝禹（宣统三年，公元1911年），梁启超（民国乙丑，公元1925年）题跋。钤“孝翁”“孝玉心赏”“孝玉永宝”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小与所藏”“孝禹”“饮冰室藏”“饮冰室”“梁启超印”“任公”等印。

（十四）《张通妻陶贵墓志》。镌于隋开皇十七年（公元597年）三月二十六日。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咸宁（今西安）。石久佚，故原石拓本罕见。文正书，十九行，行十九字。石长宽均36厘米。

该志摹本较多，其与原石之别最易辨者为裂线。若第十四行“似莲”二字间、十五行“土庄”二字间、十六行“风前”二字间、十七行“路悲”二字间、十八行“秦川”二字间，泐处横占行数如上，并通至石边者为原石拓。如泐处只占“路悲”、“秦川”等字间则为摹本。又至精摹本第七行“女”字至十二行“安”字下，尚有一条粗横裂纹，原石及其它摹刻则无此特征。另从书体观察，原拓较肥，有魏书笔意。摹刻较瘦，含唐楷书风。至精之

摹刻归南陵徐乃昌时，石已碎为四块，字划磨细，远不如初拓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乾隆年间所拓之出土初拓本。此本曾为余杭褚德彝、邹寿祺（初名安，字景叔，号适庐）、陈景陶等递藏。有褚德彝题签（光绪戊申，公元1908年）及邹景叔、陈景陶（均民国年间）题跋。钤“任杰”“为群”“两敦盖客”“任为群”“邹安”“宝瑗阁”“恣斋考藏”“陈景陶印”“觉盦任杰考藏金石书画”“松窗真赏”“觉盦珍藏”“恣斋秘玩”“褚邨堂所得碑刻旧拓本”“褚德仪印”“邹安适庐”“适庐□字景叔”等印。

（十五）《董美人墓志》。镌于隋开皇十七年（公元597年）十月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西安。陆耳山之子剑庵官兴平时得之，后归上海徐渭仁家，徐氏故名其斋曰“隋轩”。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毁于兵燹，故拓本遂稀，原拓未剪装本尤难得也。蜀王杨秀撰文。正书，二十一行，行二十三字。志长、宽均52厘米。

此志书法挺拔秀丽，字迹端妍含古意，可与欧虞相伯仲。人多翻刻之，故传世摹本甚伙。原拓首行“墓”字之“土”有点，摹刻无。第二行“汴州”之“汴”字右近细界处小有损泐，“州”字末一竖亦有泐痕。第三行“俶”字左旁笔道未损。第四行“承”字小损。末行“製”字中间小损。

汪鋆《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》谓此志有四疑。其一，碑云：美人董氏汴州恤宜人，隋书地理志无恤宜县地；其二，碑云：董氏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终于仁寿宫山第，文帝本纪是年二月庚寅幸仁寿宫，七月有李代贤反秦五俊坐事免，而无美人终于仁寿宫之事；其三，碑末云：开皇十七年十月丁巳朔十二日乙卯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制，按文帝本纪是年五月蜀王秀来朝，而庶人秀传无一语及其事，且无秀能文章之称；其四，美人当是帝所袭号，而文帝时此号未建。隋书后妃传序云：炀帝参详典故，自制嘉名，著之于令。乃有美人、才人之称。然董氏终于文帝开皇十七年，则美人何自而称？汪氏此四疑，恐疑此原志即

为伪作。然罗振玉则于《丁戊金石跋》中提出四不足疑，逐一批驳了汪氏之四疑，谓“汪氏平日并未涉史传，但见此志是隋时之作，即检隋书查之，又不详审，妄肆讥弹，不值方家一笑”云云。

馆藏最佳拓本，系嘉兴张氏（廷济）清仪阁旧藏之整拓本。后又为闽侯林白水、嘉兴陶山等递藏。

拓本中有：张廷济诗跋（道光十九年，公元1839年）；沈树镛题跋；陆恢录（民国甲寅，公元1914年）、朱锦琮书跋（道光庚子，公元1840年）；陶山跋（民国三十三年，公元1944年）；严复观款（民国八年，公元1919年）以及伊立勋题签（民国乙卯，公元1915年）。钤“叔未”“廷济”“眉寿”“嘉兴张廷济叔未甫”“树镛私印”“均初所得古刻善本”“陆恢私印”“峻斋”“严复”“白水珍藏”“陶山珍藏”“陶山”“陶昌善印”“五柳人家”“雁湖世家”等章。

（十六）《苏孝慈墓志》（注）。镌于隋仁寿三年（公元603年）三月。清光绪戊子（公元1888年）出土于陕西蒲城。正书，三十七行，行三十七字。志石长、宽均83厘米。

出土初拓本无跋。传世墨本，有出土后是年夏知县张荣升跋，刻于三十一行“文曰”之下，凡二行。不久张跋又被凿去。故此志之拓本，有无跋、有跋、又无跋（亦称凿跋本）三种之别。

初拓本“文曰”下石面光滑无损，凿跋本，因三十二行已损之“园”字又延至三十一行“曰”字下，故其石面略损。又初拓本石中界格阴文横线若隐若现，伪本因以腊涂其痕，再加工划线，则粗而显见。

赵万里于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中赞此志曰：“字体方整，开欧柳之先河，关中所出隋志，除咸阳近出《独孤罗墓志》外，无出其右者。”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长州章钰旧藏之出土时初拓本。无张荣升刻跋。有章钰（光绪丁未，公元1907年及民国戊午，公元1918年）

题跋。钤“四当斋”“章钰”、“曙弄学人”“章钰题记”“茗理书记”“式之题记”等印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亦系出土时初拓本。梁启超旧藏，有梁启超题签。钤“饮冰室”“饮冰室藏”“梦惺所得金石”等印。

注：苏氏讳慈，孝慈字也，史以字行，故仍从之。

(十七)《尉富娘墓志》。镌于隋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五月。清同治十年出土于陕西长安。初为怀宁张木三购得，后又为南海李山农收藏。宣统元年(公元1909年)归天津王氏，现存上海博物馆。志文正书，二十四行，行二十四字。盖阳文，篆书，四行十六字。石长44、宽43厘米。

此志在张、李、王三家收藏时，传拓较少，故翻刻者较多。其版有以石刻者，亦有以木刻者。翻刻之最佳者，系肥本《尉富娘墓志》，然除较原本字肥外又无志盖。原石第二行“曾”字损，翻本未损，“兜”字完好，翻本泐其右半。原石第三行“周”字损作圆形，摹刻无；又“大司空”之“大”字微凹，故拓本中间笔画漫漶。原石第十三行“兴”字右二笔泐并。也有以肥本为原石者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曾为王孝禹及梁启超递藏。有王孝禹(民国元年，公元1912年三月、民国癸亥，公元1923年)、梁启超(民国乙丑，公元1925年)题跋。王孝禹题签。钤“孝禹”“孝禹考藏金石文字”“铜梁”“孝玉永宝”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任公”“启超”“饮冰室”“饮冰室藏”等印。

馆藏另一部，为周季木旧藏肥本《尉富娘志》。周误认为真本，反将原石拓本附于后。此拓本有郑文焯(苕菴主)及周季木(民国六年三月与六月)题跋。钤“季木”“建德周氏鉴藏秘笈”“吴□”“季木所得”“木居士”等印。

(十八)《元智妻姬氏墓志》。镌于隋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八月二十四日。清嘉庆二十年(公元1815年)与其夫《元智墓志》同时出土于陕西咸宁(今西安)。后归武进陆耀遹。石毁后

为恽毓嘉购去，现存故宫博物院。文正书，二十七行，行二十七字。志石长、宽均48厘米。

此志自出土至咸丰九年期间均完整无损。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毁于兵燹，仅存残石一方。灾后初拓本第十八行“仁”字尚完好，下行“盛”字损钩笔；晚本则“仁”字二横笔右损，“盛”字损右半。

翻刻本较多，长沙徐氏翻本较早。原本首行“夫人”之“夫”字下有泐痕如点，翻刻本均无。原石铭词中“晝哭”之“晝”字刻作“畫”；翻刻本刻作“畫”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出土初拓未断本。此拓本曾为王原祁、龚自珍、顾千里、缪荃孙等递藏。有龚自珍（道光乙酉，公元1825年）题跋。钤“麓台”、“王原祁”“龚自珍印”、“汉后隋前有此家”、“古吴缪氏考藏”、“一曲琴中见古人”等章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亦系出土时初拓本。此本曾为陆耀遹、王孝禹、梁启超递藏。有王孝禹题签与王孝禹（光绪三十一年，公元1905年）、梁启超（民国乙丑，公元1925年）题跋。钤“武进陆氏藏石”“孝禹”、“王氏金石”、“孝玉永宝”、“双涛阁”、“孝玉心赏”、“王瑾”、“孝禹考藏金石文字”、“丁未生”、“孝玉”、“王瑾之印”、“梁启超”、“任公”、“新会梁氏”等章。

（十九）《段俨妻李氏（文安县主）墓志》。镌于唐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三月二十二日。清嘉庆初年出土于陕西醴泉。为乾州士人所得，后为吴县吴大澂收藏。正书，二十九行，行二十九字。石长、宽均64厘米。

此志无撰书人姓名，但其文典丽华美，字体亦工整有法，当出于翰苑名手。铁保赞此志曰：文章尔雅，楷法端庄流利，兼有率更登善之长，实可宝也。

出土初拓本，首行“文安县主”之“文”字未泐，晚拓则“文”字全泐。有翻刻本，略小于原石，易审。石存陕西西安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出土初拓本。此本曾为铁保、梁启超递藏。有铁保题签及其于丁巳（嘉庆二年，公元1797年）中秋，戊午（公元1798年）四月，辛酉（公元1810年）三月，壬戌（公元1802年）十月的多款题跋，以及梁启超乙丑（民国十四年，公元1925年）题跋。钤“岚石山房”“饮冰室藏”“启超”“任公”“脱身事幽讨”“老铁”“饮冰室”“梁启超”“青门闲客”“铁梅”“老铁手书”等印。

馆藏较佳整幅拓本，系咸同年间拓本。为蓬莱丛氏旧藏，钤“明德楼珍藏”“蓬莱丛三珍藏”“耕石斋所藏金石文字”等印。

（执笔人：冀亚平、王巽文）

误一人为二人

——《史记》标点纠误一则

《史记·赵世家》曰：“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。医扁鹊视之，出，董安于问。扁鹊曰：‘血脉治也，而何怪！在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告公孙支与子舆曰：……，’司马贞索隐：“二子，秦大夫公孙支、子桑也。”6/43/1787

按，索隐支字标点大误。二子，指公孙支与子舆，二人皆为秦大夫。公孙支，即公孙枝，字子桑。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杜预注：“公孙枝，秦大夫子桑也。”《国语·晋语三》韦昭注：“公孙枝，秦公孙子桑也。”《李斯列传》索隐：“公孙支，所诸子桑也，是秦大夫。”所注甚明。若依如上标点，则公孙支与子桑判若二人，此误一人为二人。应将逗号删除，“大夫”后加句号，顿号改为逗号，标作：“二子秦大夫。公孙支，子桑也。”赵世家》这段文字又见于《扁鹊仓公列传》索隐文字也基本相同，仅“二子”与“秦大夫”之间增一“皆”字，标点即不误。

·陈冠明·